

大战略研究丛书
Studies in Grand Strateg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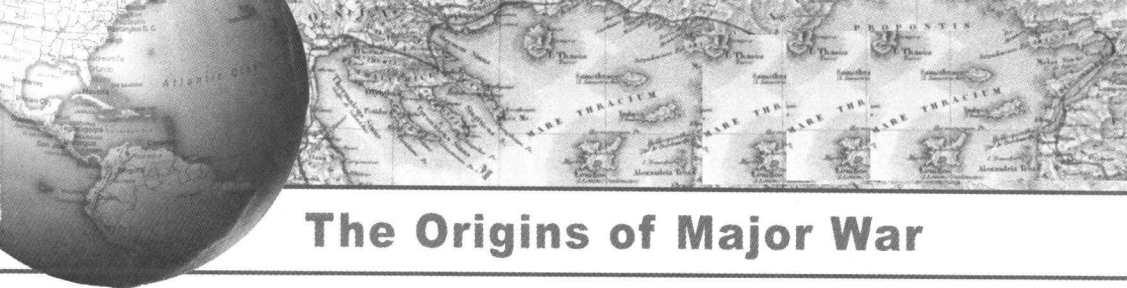
The Origins of Major War

大战的起源

〔美〕戴尔·科普兰 著
黄福武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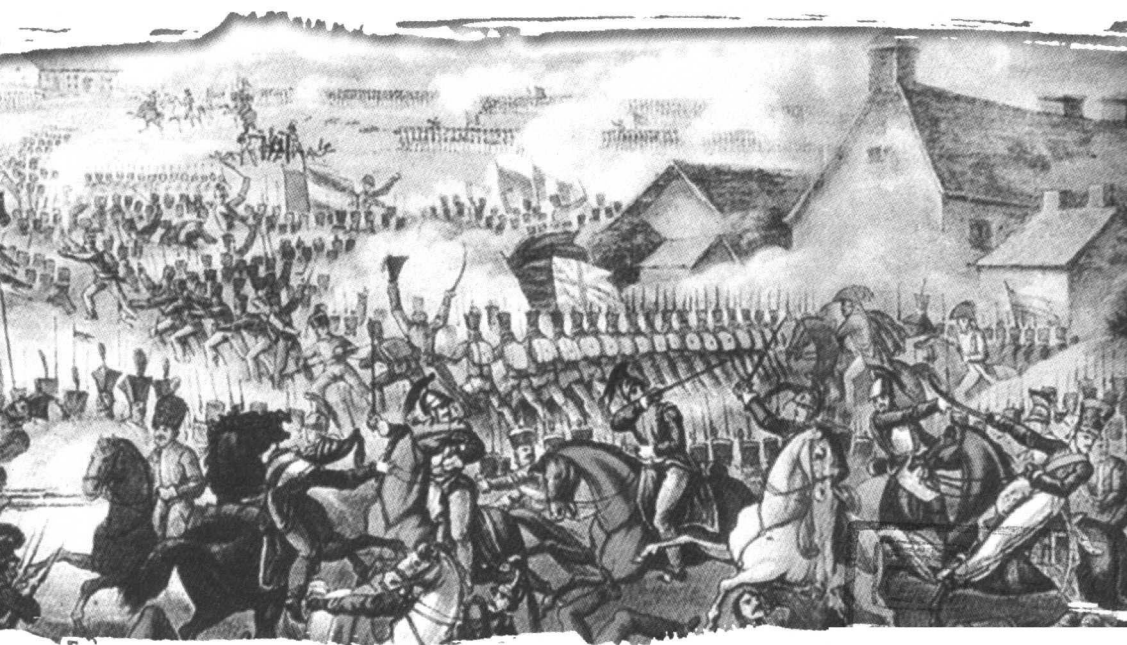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The Origins of Major War

大战的起源

〔美〕戴尔·科普兰 著
黄福武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04-5641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战的起源/(美)科普兰著;黄福武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5

(大战略研究丛书)

ISBN 978-7-301-13711-6

I. 大… II. ①科… ②黄… III. 战争理论-研究 IV. D06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57244号

The Origins of Major War, by Dale C. Copeland,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Copyright © 2000 by Cornell University

This edition is a translation authorized by the original publisher.

书 名: 大战的起源

著作责任者: [美]戴尔·科普兰 著 黄福武 译

责任编辑: 徐少燕

封面设计: 春天书装工作室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3711-6/D·2044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ss@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5016/62753121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三河市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毫米×980毫米 16开本 25.5印张 390千字

2008年5月第1版 2008年5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50.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总序

跨入 21 世纪,我们迎来一个战略构想的时代。

回首以往,人类历经磨难与碰撞,大战略研究在纷繁复杂的现实中产生、起步、发展;展望未来,人类进步面临着巨大不确定性和机遇,理想与现实交织构成一幅饱含想象与塑造空间的宏大画卷,未雨绸缪事关各国尤其是主要大国的未来,大战略研究即将迎来黄金时代。

—

大战略是对历史的总结、当前的把握、未来的选择。对大国或潜在大国的未来而言,战略谋划至为关键,而大战略研究可为国家战略谋划奠定理论基础、历史纵深、世界眼光、全球视野,对其战略目标的确定、战略路径的选择、战略步骤的安排至关重要。作为国家实力与世界地位之间的桥梁,大战略研究与大国的前景休戚相关。极言之,它事关一个大国的贫富、兴衰、存亡。

对战略重要性的推崇,历代战略家从来不惜笔墨,真知灼见更是俯拾皆是,如“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夫权谋方略,兵家之大经,邦国系以存亡,政令因之而强弱”。安德烈·博富尔(Andre Beaufre)的总结恰当其实:“当历史之风吹起时,虽能压倒人类的意志,但预知风暴的来临,设法加以驾驭,并使其终能服务于人类,则还在人力范围内。战略研究的意义即在于此。”大战略研究发端于 20 世纪早期,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尤其是全球化的日趋加深和各国战略手段的多样化,其重要性逐渐凸现出来。但正如利德尔·哈特(B. Liddell Hart)所言,“大战略研究的极大部分领域尚属于有待探勘和了解的未知地带”。冷战结束以来,世界进入大战略谋划的新时代,促进大战略研究的现实条件已经具备。

大战略研究不仅需要现实的磨砺,更需要学者的推动。大战略

研究强调战略学者的重要性,将他们的深谋远虑视为国家保持长治久安的基础条件,如欧阳修指出的,“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伶官传序》)。孟子曰:“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孟子·公孙丑上》)。即使没有雄厚的物质基础,伟大的战略家依旧可以建功立业。鉴于大战略研究的全局性、宏观性、前瞻性等特征,战略学者必须具有专业性的战略素养。简言之,大战略学者应是饱学的史学家、远见的哲学家、深刻的思想家、敏锐的战略家,具有丰富的学识、弹性的心灵、高度的智慧、进取的精神。

大战略研究强调把握时代的脉搏,体现时代的特征,满足时代的需求。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①只有把握住时代的脉搏,预知、掌握并引导时代的潮流,大战略研究才能更好地以国家战略利益为依归。

二

21世纪初,世界迎来了中国崛起的曙光。这场历史性巨变肇始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加速于1978年启动的改革开放,其高潮却刚刚来临。我们尚未把握这场巨变的最终结果,但是全世界却从中感知到了中国崛起带来的震撼。

对中国而言,20世纪是一个真正的大时代,一个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转折年代。20世纪前半叶,中国尚处于不稳定的国际体系的底层,所求者首先是恢复19世纪失去的独立与主权;20世纪下半叶,中国迎来历史性的崛起,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现实的期望;尤其是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国主动开启了融入国际体系的进程,并逐步成为国际体系中一个负责任的、建设性的、可预期的塑造者。概言之,20世纪,中国由弱国向强国发展,从封闭走向开放;世纪之交,世界政治经济体系面临空前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中国改革开放步入关键阶段;进入21世纪,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世界的力量组合和利益分配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的未来走向更是举世瞩目,中国崛起成为全世界关注和研究的全球性议程。中国崛起与世界转型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页。

似乎相约而行,这种历史性重合既给人类发展带来了空前的机遇,也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中国崛起为我们的大战略研究提供了时代机遇和理论诉求。中国崛起在全球化和复合相互依赖加深的背景之下,而它们极大地扩展了中国的战略议程。对于面临重大契机的中国而言,如何确立适宜的大战略至为关键。只有确立了大战略,中国才能据此开发、动员和运用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精神资源实现国家的根本战略目标,而不至于拘泥于一时一事的得失。在思考这一问题时,我们遗憾地发现,大战略思维储备不足、目标不甚清晰、框架不够宏观、途径不具操作性、手段不够多元化、心态不甚客观等构成了当前中国战略研究的种种缺憾。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的相关大战略研究往往以西方历史经验比附中国的战略思想与战略选择,忽视中国五千年的战略思想积淀,这无疑构成制约中国大战略研究取得突破的重要障碍。

从全球层次着眼,这是一个诸大国进行战略谋划的时代;对中国而言,这是一个呼唤大战略的时代,更是一个构建大战略的时代。战略学者生逢其时、躬逢其盛,中国崛起为其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提供了历史机遇。

三

有鉴于此,北京大学出版社决定与中科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合作,编辑、出版《大战略研究丛书》。两家机构的决定可谓慧眼独具,既体现出以国家需求为使命的现实高度,亦展现出致力于学术追求的理想气魄。

本套丛书以中国崛起为经,以大战略理论探索为纬,以史为镜、评估当今、展望未来,致力于推动中国大战略研究的民族化、国际化和专业化,力图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从研究范围、研究内容、研究方法、技术路线等方面逐步确立中国大战略研究的基础,搭建大战略研究的中国平台,并推进中国大战略研究基地的创建。

本套丛书由两部分组成:西方学者的经典旧作和最新力作、中国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大战略基础理论和方法论、大战略国际比较、中国大战略等构成本套丛书的重点。简言之,我们不仅要推窗赏月,还寄希望于推陈出新。具体地说,引进是促进中国大战略研究不可

或缺的环节和纽带。相比而言,西方学者的大战略研究起步较早,基础雄厚,精品璀璨。一些经典著述所蕴藏的思想财富、战略意义和学术价值,为学界同仁所允可,乃获推崇。翻译引进这些著作将是促进中国大战略研究的积极因素。在中国丰富的传统战略思想基础之上推陈出新更将体现我们的学术追求。中华文明有着几千年生存发展的战略智慧,其现代化将使人类文明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中国学者应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寻战略研究之道,融合东西方文化之长,从而撰写出既体现中国传统战略思想底蕴又包含西方文化精髓、既立足于当前现实又着眼于未来谋划的战略著作。基于这种考虑,我们将延请国内一流的战略学者撰写学术精品,以飨海内外学者与读者。

本套丛书的组织得到中科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教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外办副主任裘援平博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约翰·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教授的鼎力支持。美国波士顿学院陆伯彬(Robert S. Ross)教授积极引荐西方大战略著作,居功厥伟。

本套丛书的组织体现了国内学术新锐联袂推进中国战略研究的努力。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社科院、中共中央党校等学术机构的青年学者为了共同的学术目标走到了一起,为中国大战略研究各尽心力。

期盼中国各界支持我们的学术追求,让我们一同畅想大战略研究的未来。

是为序。

《大战略研究丛书》编辑委员会

2004年12月14日

译序

大战理论的一个现实主义范本

自人类历史上发生战争以来,许多人尤其是政治家、历史学家和国际关系学者就一直在追问:大战为何发生?这也正是本书作者开篇提出并致力阐述和试图解决的问题。自修昔底德写下《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和约瑟福斯记述《犹太战争》开始,大战的起源问题就像一团迷雾笼罩着全世界渴望和平的人们的心灵,成为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最为古老但却最难回答的问题之一。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见仁见智,论争不断。人们一般都倾向于认为,每一次大战的发生各有其不同的原因,战争只是个案,历次战争及其起源之间并没有内在的必然联系。但本书作者却独辟蹊径,在对战争起源的三种流行的现实主义观点进行剖析的基础上,通过理论演绎和经验分析,综合出自己的全新的大战理论,即所谓动态差异理论。这一理论不仅得到历史上发生的诸多大战案例的支持,而且也有助于解释历代体系甚至世界的稳定性问题。这一理论既具有演绎逻辑性,又具备经验基础,是一种关于大战起源的现实主义理论。

作者通过理论演绎和实证分析,从体系层面对大战的起源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作者致力于创建新理论的立意和果敢令人叹服,这不是一般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能够做到的。纵观全书,作者在理论上推理缜密、论述严谨、结论明确,所举案例史实清楚、分析精确、环节紧凑,传统的方法论得到了充分体现。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一理论的形成是大战起源理论研究的一块界碑。尽管人们可能对作者的某些观点不能完全接受,但本书作为现实主义大战理论的一个总结性文本,必将在国际关系文献中占有一席之地。

动态差异理论的特点

近代以来对大战起源的思考,正是人们战后对引发战争诸因素

的一种理性、积极却又无奈的反思,反映了人们对战争灾难的痛苦评价和对和平前景的乐观渴望,其目的无非是为了找到战争的原因并尽可能地予以防范。但如果每一次战争的原因各不相同,或者每一次战争是偶然发生的,没有什么规律可循,那么战略上所谓防范战争就无从谈起。作者提出动态差异理论的初衷就是要努力解决这一问题,在积极、科学地预测体系中战争发生时间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预防战争的可能性。正如其理论的命名,动态差异理论的核心就是“体系中的力量动态差异”。我们可以从如下关键词来分析这一理论的特点:

1. 体系

作者把影响战争发生的因素分为体系层面、国内层面和个体层面(亦称单元层面)。如果从单元层面看,历次战争无疑充满了偶然性,正如作者所列:汉尼拔的复仇心理驱使他于公元前218年攻占了罗马;新教与天主教国家之间的宗教差异引发了“三十年战争”;拿破仑在欧洲恣意横行折射出他的极端利己主义和权力欲望;那些卷入1914年世界大战的国家是出于对竞争对手先发制人的担心;而纳粹的思想意识和希特勒的个性则直接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所谓把握大势,即从体系层面的高度解读大战的起源问题。作者在导论部分提出了大战的定义(或特征):一个体系中的所有大国都被卷入其中;战事是以最高强度进行的全面冲突(即全面的军事动员);战争的结果极有可能是一个或多个参战大国被消灭。这一定义是作者构建其理论或模型的基础,而这种宏大的时空观则为预测大战发生的可能性提供了现实的框架。只有站在体系层面的高度,才可俯瞰整个体系中的力量差异和变化趋势,在偶然中发现必然:体系中正在衰退或感觉正在衰退的大国更有可能发动战争。在任何体系中,国家分立造成了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体系内各国在本性上既是倾向于寻求安全的行为体,又是防范心理作用下的潜在挑战者,因此,任何体系规模的所谓预防性战争都是具有一定实力的大国试图解决自身安全困境的产物。

2. 力量

无论从何种角度进行分析,绝对力量的强大无疑是大国发动大战的必要条件和基本保证。作者在构建自己的理论时,对力量(power-

er)这个关键词进行了深入的解读。他把一个国家的力量分为三种,即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潜在力量。而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往往是一个国家的潜在力量,即一个国家所有可能转化为经济力量并最终转化为用于战争的军事力量的资源,如人口、国土面积、原材料、技术等。对一个具有发动战争能力的国家而言,这三种力量的绝对和相对水平分别影响着国家的短期、中期和长期战争政策,如“生存空间”问题曾多次成为军事帝国主义者认为自身陷入生存危机乃至发动战争的理由。

根据一般的常识,体系中小国的影响作用是微不足道的,首要原因就是力量上的弱小。但对于大国,情形则完全不同,力量上的强大使之具有向体系挑战的“资本”或至少有可能实施这种挑战。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靠实力说话”。对于这样的大国,只有在体系中奠定力量地位,才能掌握对外展示自身形象和采取行动的主动权,根据形势和时机作出政策选择,或韬光养晦,或和平接触,或遏制威慑,或引发危机乃至发动战争。因此,对军国主义者而言,积蓄力量就等于战争准备。而评价一个国家是否有战争意图,不仅要看其是否具备内部条件即陷入衰退或出现衰退趋势,不仅要看其绝对力量和相对力量水平,或其经济力量和潜在力量水平,更要看其将这些力量转化为军事力量的能力和程度。在作者所列举的大战案例中,战争发起国无一不是在具备了绝对实力以及强大的转化能力后,才敢于向既有体系挑战而发动战争的。不仅如此,这些国家发起战争的目的,也无非是为了消灭敌对国的军事力量,攫取其经济和潜在力量,从而建立起自己的霸权地位。

3. 动态

力量是大国赖以生存甚至发动大战的必要条件,但其重要性主要是通过相对性和动态性表现出来。一个国家可能十分强大,但这种强大只有放在体系框架下才有实际意义,即一个国家只有在政策上取得“相对成功”才能在某种程度上取得优势地位;一个国家可能一度十分强大,但这种强大只有不断增长或具有长期增长趋势,即进入所谓的稳定崛起阶段,才能奠定所谓的大国地位,在体系中成为举足轻重的一极或至少拥有称霸潜力。

根据事物发展的规律,力量的相对水平和政策的相对成功必然是动态的。这种动态性在国际关系中的主要表现,就是历史上一代

代霸权梦的破灭和一个个霸权者的失败。且不说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各方霸主“你方唱罢我登场”的频繁更迭,就是现代出现过的两极争霸局面也早已成为历史。力量的动态性虽然为战争发起者创造了地缘条件,但也注定了其迅速灭亡的下场。在这方面,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4. 差异

国家无论大小,若要发动战争,除自身意识到陷入了衰退之外,另一个动因或者说诱惑就是往往自以为已经取得全面或至少保持着某一方面的优势。这种优势是相对而言的,与自身的增长速度、地缘政治以及体系内各国的对外政策有关。对国家领导人来说,力量的正差异或者说对这种差异的估计是敢于向体系挑战的“资本”,其政策基础就是各种相关的定量研究,如本书附录中的数据比较。其实,差异即不对等是偶然冲突发生的重要原因,这可以说是为人们普遍接受的“常识”。战术上的例子如中国古代的田忌赛马,获胜的原理就是出于对力量差异的正确估计;战略上的例子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对力量差异的错误估计造成决策失误,对体系的挑战以失败而告终。

总之,这一理论从体系层面分析了力量的动态差异及其后果。唯有建立在体系层面之上,才能解释体系范围内大战起源的规律性;唯有抓住力量这一核心词,才能形成大战发生的必要条件;唯有认识到力量是动态的,才能把握战争或和平的走向;而唯有分析力量上的差异,才能最终决定政策的方向与战争的结果。也就是说,战争的发起与进行是以自身的绝对力量为保证的,而这种力量在体系中是动态的和相对的,并且力量上的差异具有决定意义。作者正是通过赋予体系层面的各种力量以动态性和差异性,以与此相关的各种因素作为非独立变量或参数,构建起了自己的研究分析平台。也就是说,宏大的时空观和力量的可变性是这一理论的基本点,也是我们理解和阐释这一理论的切入点。

动态差异理论的现实意义

任何一种现实主义理论的建立和发展都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动态差异理论建立在演绎逻辑与经验实证基础之上,是一种现实主义理论,其实践意义是不容置疑的。作者本人对这一点也毫不讳言,

甚至声称自己创建的理论是对外政策的体系理论,目的是为决策者(主要是美国的决策者)服务的(见本书第九章)。虽然当前的国际格局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世界大战以及重大危机的可能性相对减小,以遏制为主要手段的强硬政策很难有作为,多极世界的形成和国际体系的相对稳固使各大国家程度不同地奉行和平接触政策。然而,大战的因素依然存在,对大战起源问题的研究不仅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此,我们还是可以从动态差异理论中找到一些可资借鉴或具有启发意义的东西。

1. 对中国大战略的构建提供启示

当前,中国崛起是举世关注的重大议题,各种争论尤其是“中国威胁论”一度甚嚣尘上。中国已经在国际体系中奠定了大国地位,中国的和平崛起也使得各种谬论不攻自破,同时也为中国学者的大战略研究提供了历史机遇和理论要求。对于面对重大契机的中国而言,如何确立适宜的大战略至关重要。《大战略研究丛书》旨在以中国崛起为经,以大战略探索为纬,以史为镜、评估当今、展望未来,致力于推动中国大战略研究的民族化、国际化和专业化,力图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从研究范围、研究内容、研究方法、技术路线等方面确立中国大战略研究的基础,搭建大战略研究的中国平台,形成大战略研究的理论框架。丛书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代年轻的国际关系学者对国家大战略研究的关注和努力,这种立意高峻、气魄恢宏的奠基性研究必将得到学界的响应,并引起国人的积极思考。

在全球化和经济相互依赖日益加深的背景下,中国的崛起必须面向未来,置身于国际体系中谋划发展战略。为此,作为一个经济上正在崛起的国家,必须在国际环境和体系中确立自己的大战略。只有确立了大战略,才能据此开发、动员和运用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精神资源实现国家的根本战略目标,而不拘泥于一时一事的得失。^① 研究动态差异理论,有助于从体系层面上确立对外政策、建构国际关系和谋求长期发展,有助于从宏观上合理安排、理性调整和充分利用各种有限的资源,有助于观察体系中各种力量的动态差异

^① 门洪华:《构建中国大战略的框架:国家实力、战略观念与国际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6—57页。

和变化趋势,有助于对未来的生存与发展概率作出正确的预期,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国家大战略。

2. 积极防范战争尤其是体系战争

如果了解了大战的起源,就可以理性地对待全球一体化背景下的竞争与合作,为共同发展谋求和平环境,为全人类的福祉作出贡献。人们渴望和平,痛恨战争。和平与发展是各国的共识,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本身就有利于安全最大化,经济和贸易手段已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重要途径。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虽然穷兵黩武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老式的军事帝国主义手段已经难有作为,好战的领导人也无法取得国内公众的支持和国际社会的认可,但战争的因素依然存在,局部战争时有发生,经济制裁和贸易摩擦随时会引发各种危机,为争夺资源而造成的冲突直接影响到一些敏感地区的稳定。这些问题理应引起各国领导人的重视,同时也对各国的国际关系学者提出了新的理论和应用课题。对大战的起源问题进行深入的经验分析和理论研究,有助于各国尤其是大国把握自身的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策略,从而更加有效地防范战争尤其是体系战争的发生。这是作者提出这一理论的目的之一,也是我们对这一理论进行研究的重要原因。

3. 为和平崛起创造条件

和平环境是任何一个理性个体、组织乃至国家期待和追求的生存理想。中国奉行和平崛起战略,是与其一贯的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坚定立场相一致的,是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贡献,有助于防范体系规模的战争,有助于建立起健康的国际新秩序。各国政治家和国际关系学者认为,20世纪末期两极格局结束之后,国际体系在世纪之交进入了多极时代。其实,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大势驱动下,各国不同程度地奉行和平接触的对外政策,过去炽热一时的“极”理论也日渐黯淡下来。对大战起源理论进行研究,有助于分析和制定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策略,寻找和平崛起的契机,从而创造出有利于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这一点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尤其重要,但仍有赖于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在这种国际环境下,国际组织的作用日显突出,各种国际组织尤其是联合国在解决国际体系中的多边经济纠纷、贸易摩擦、政治危机甚至地区争端时表现出足够的理智、决心和权威性。

作者用全新的理论模型在体系层面上对大战起源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其主要现实意义就在于为国家尤其是大国构建大战略框架提供理论和实证依据,进而促进各国为防范战争作出积极的努力,以便为国际体系的和平与稳定创造有利的条件。

动态差异理论的缺陷

本书作者对人们十分关注的大战起源问题在理论上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对一些典型案例作了经验分析,用大量的史实构筑起自己新的现实主义体系理论——动态差异理论。然而,这一理论毕竟是学者的“研究成果”,虽然作者也谈到这一理论的政策意义,但要说这就是关于大战起源的最后结论(说最后,只是相对于作者分析和批评的三种现实主义理论而言),恐怕还为时尚早,更何况这一理论的普遍性和操作性也有待探讨。读者在研读本书时,难免会发现其中仍有一些值得商榷之处。

比如说,这一理论不适用于局部战争尤其是现代战争。我们必须承认,体系规模的大战并不多见,现代国际环境下爆发大战的可能性则进一步减小。如前所述,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代世界的主题,随着多极体系的形成和国际组织的作用日益突出,经济建设与和平发展策略成为各国及其领导人的理智选择。同时,国际冲突的表达形式也已经发生了实质性变化,体系中的大国或潜在大国开始选择放弃以殖民政策、掠夺资源和争夺生存空间为主要内容的赤裸裸的侵略手段,转向以和平接触与调停作为解决争端的重要途径。当然,局部战争和地区冲突仍然时有发生,但多由作者所称的单元层面因素引起(如宗教和种族政策原因),也就是说,此类战争的原因的确是多种多样的,并且难以形成多边或体系规模。不仅如此,争夺生存空间的传统思维也已失去了国内和国际环境基础,各国对自身不断发生的各种衰退很难在外部找到排解的出口。因此,在目前的国际环境下,作者所述理论的局限性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现实基础和应用力度。

另外,历史叙述难以摆脱“欧洲中心论”。虽然作者论述精到、史料翔实、结论果断,但在思想深处仍难以跳出欧洲中心论的窠臼。本书所举案例从古至今全部是欧洲发生的“大战”,所谓体系只是欧洲体系,战场只是欧洲战场,甚至连太平洋战争(包括二战远东战场、东

南亚战场以及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中国历史上的大规模战事(如战国时期和成吉思汗远征)也未列入其“大战谱”或作为案例进行相关分析。这一事实说明,即使作者并非故意如此,但至少表明他对其他地区的历史并不十分关心或不熟悉,或无法获得相关资料。

上述只是作为译者也是本书的仔细研读者对本书作者及其理论的一点粗浅看法,期望对读者阅读本书有所帮助。由于译者在知识和学问上的粗陋,真正做到译事与研究两面精到尚是目标。如果本书译文和这篇小文能为读者提供些许引导和学习上的益处,那就算是译者的分内之幸和意外之喜了。

本书的翻译难点颇多,既有专业理论方面的,也有资料史实方面的,当然也有写作风格方面的。幸赖多方共同努力,今日终于得以成书,推敲的艰辛与快乐也算告一段落。译事之难在于看似浅易,实则深奥,字词之间往往“旬月踟蹰”。从某种程度上讲,译事一如战事的复杂与多变,一旦发生就要做长期作战准备,但以此作为时日延宕的理由也显苍白,译者愿就此向读者致歉。

在本书翻译过程中,《大战略研究丛书》的主要组织者之一门洪华教授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和指导性意见,北京大学出版社的耿协峰和徐少燕两位资深编辑做了大量的专业性工作,在此仅对他们的善意、严谨和耐心表示由衷的敬佩和真挚的谢意。

黄福武

2008年3月

致 谢

本书的写作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我非常感谢许多师长、同事和机构的帮助。在此,我尤其要感谢芝加哥大学的三位学者: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和查尔斯·利普森(Charles Lipson)。他们时常提出深刻的见解,从而使我能够专心致志地完成书稿。他们的无私帮助和鼓励,我永远铭记心头。康奈尔安全事务研究所的罗伯特·阿特(Robert Art)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审校者和学术编辑,他的全面评审意见对最后文本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还要感谢康奈尔大学出版社的两位评论家,他们对书稿提出了详细而有益的建议。其中,斯蒂芬·范埃弗拉(Stephen Van Evera)还为未来的研究项目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路。我还要感谢霍普金斯大学的查尔斯·多兰(Charles Doran)和乔治·利斯卡(George Liska),他们最早激励我对大战起源的动态现实主义方法(dynamic realist approaches)进行研究。

在本书的成书过程中,我的各位同事在许多重要问题上提出了大量的建设性意见,他们是:Michael Barnett, Eric Budd, Michael Desch, John Duffield, Matthew Evangelista, James Fearon, Ben Frankel, Charles Glaser, Hein Goemans, Gary Herrigel, Ted Hopf, Alastair Iain Johnston, Chaim Kaufmann, Andrew Kydd, David Laitin, Melvyn Lefler, Jeffrey Legro, Jack Levy, Allen Lynch, Sean Lynn-Johnes, Benjamin Miller, Andrew Moravcsik, Sharon Morris, Ido Oren, John Owen, Scott Sagan, Len Schoppa, Herman Schwartz, Randall Schweller, Jack Snyder, Michael Spirtas, Jennifer Sterling-Folker, Ashley Tellis, Marc Trachtenberg, Daniel Verdier, David Waldner,以及 Alexander Wendt。我还要感谢弗吉尼亚大学的研究生 Spencer Bakich, Eric Cox, Kelly Erickson, Mark Haas,以及 Dennis Smith, 他们的建议帮助我形成了最后的论点。Mario Feit 和 Scott Woodart 则协助我翻译了部分德语文件。

来自不同机构的资助对完成这一研究项目起到了重要作用。哈佛大学科学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提供的博士后基金为研究更多的案例营造了一个必要的环境。我还要感谢哈佛国际事务研究中心奥林战略研究所的 Samuel Huntington 和 Stephen Rosen, 他们使我有机会作为助理研究员参与该研究所的工作。本书原稿的写作得到了下述机构的大力协助: the John D. and Catherine T. MacArthur Foundation; the Andrew W. Mellon Foundation; the Phoenix and Century Fellowships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Council of Canada; 以及 the Sesquicentennial Fellowship at 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本书第一章和第八章的部分内容引自“Neorealism and the Myth of Bipolar Stability: Toward a New Dynamic Realist Theory of Major War”, *Security Studies* 5, no. 3 (spring 1996) 关于现实主义的专题, 感谢 Frank Cass Publishers 允许我引用其中的资料。我还要感谢康奈尔大学出版社的 Roger Haydon 的长期支持及其在编辑过程中提出的宝贵建议。

最后, 我要衷心感谢三位对本书的出版帮助最大的人。娜塔莎·科普兰使我在漫长的写作过程中始终保持充分的信心, 并以其真知灼见使我在写作的同时一直关注着整个世界。我要把这部著作献给我的父母芭芭拉·科普兰和克莱尔·科普兰, 他们在我的少年时代激发了我对政治的兴趣, 并鼓励我追求自己的梦想。对于他们, 怎么感谢也不为过。

戴尔·科普兰

于弗吉尼亚夏洛茨维尔